

回顧港九大队



广东青运史研究委员会研究室
东纵港九大队队史征编组

回顾港九大队



广东青运史研究委员会研究室
东纵港九大队队史征编组

封面题词: 曾 生

责任编辑: 曾锦华

广东省委办公厅 印刷厂印刷
劳动服务公司

前　　言

继出版了《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六个中队队史》一书以后，《回顾港九大队》又同广大读者见面了。

在这本书里，我们收集了港九大队以及所属的六个中队和长枪队、短枪队在港九地区开展了三年多的抗日游击战争的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当年港九大队的领导，各级和各条战线上的指战员们，他们现在虽然年逾花甲、古稀，但四十多年前的战斗历程，壮丽的民族解放事业的斗争经历和英勇牺牲的英烈们的忠魂，激励着他们乐于牺牲自己的休息、休假时间，有的聚首汇编，叙事忆情，有的在夜幕下伏灯持笔，记载历程，撰写下自己的战斗、成长经过，谱写出怀念战友的赞美诗篇。

当年东江纵队的司令员曾生同志为本书题了封面词。全书共收集了一百多位原港九大队的指战员撰写的七十五篇文章、诗歌。《回顾港九大队》为编写华南抗日战争和东江纵队的史料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也对《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六个中队队史》的具体情节作了详细的叙述，更重要的是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材。

《回顾港九大队》一书由原港九大队的部分老同志组成征集编写组，成员有方兰（组长）、梁超（副组长）、何杰（副组长）、王江涛、罗欧锋、张子燮、蔡松英。原东纵江北指挥

部指挥员周伯明、原港九大队领导人陈达明、黄冠芳、黄云鹏为顾问，还有联络员林苑明、唐华、袁卓峰、欧坚、吴惠琼、蔡松英（兼）和特派联络员陈亮明、邓振南。征集编写组主持了征集工作，广东青运史研究委员会研究室负责编辑。在封面设计工作中，我们得到了陈宏新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缺点和错漏之处，诚恳希望革命老同志和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一九八七年五月

目 录

(下 集)

二月行动——记市区中队第一次向日寇进攻	陈 敏	(1)
碧血繁花相映红	柳 明	(11)
四月春雷	梁 福口述 纪 文整理	(18)
儒林台八号——忆文淑筠同志与对敌观察哨	纪 文	(28)
地下火	纪 文整理	(35)
记港九地下中队往事	黄施民	(42)
一个制造“纸弹”的工厂		
——记市区中队地下油印室	黄静仪	(44)
在市区中队印发传单的日子里	梁 芸	(47)
战斗在没有枪声的战场	黎 成	(52)
往事回顾	郑 斌	(58)
红磡区的抗日游击战士	黄灯明	(66)
船厂地下斗争	何家日	(71)
穷孤儿成长为市区中队战士	黄港山	(76)
印刷工人的斗争——在日寇统治下的中华书局	吕少枚	(80)
在中华书局进行对敌斗争	刘洁云	(82)
一个难忘的学习班	吕少枚	(86)
虎口治病		(90)
畅通无阻	张 景	(93)
西贡人民对港九大队的支持	蔡仲敏	(95)
英雄颂	梁雪英	(99)

回忆西贡区的民运工作	张婉华	戴宗贤整理	(101)
怀念哥哥李唐同志	唐 华		(118)
从一个小村看香港人民的抗日热情	张 发		(123)
袭击牛房岗哨	詹云飞		(125)
悼念梁斌同志	梁雪英		(126)
容娇和申娇	林苑明		(128)
民运工作二三事			(130)
抗日游击队的母亲——凌娘	梁雪英		(134)
忆战友容娇的一家	梁雪英		(137)
一个不带枪的游击战士	梁雪英		(139)
大埔风云	张 才		(141)
沙头角中队接降斗争回忆片断	陈敏学		(145)
乌蛟腾村人民的英勇抗日事迹	蔡 华		(150)
在乌蛟腾一带的工作	李贵仁		(155)
抗日战争中的石水涧村	林 传		(161)
惩治伪区长温二记	黄义中		(162)
一次伏击海匪的战斗	卓觉民 游 扬		(165)
夜袭吉澳	林 传		(167)
樟树滩伏击鬼子	林 传		(169)
戊叔与海上交通线	林 传		(171)
把尖刀插进敌人心脏	欧 坚		(173)
忆大屿山中队的战斗片断	王江涛		(179)
积极开展受降斗争 夺取最后的胜利	王江涛		(186)
大屿山岛妇女二三事	陈绍明		(192)
唇枪舌战 降伏海匪黄公杰	杨 庆		(195)
南海英豪	吴 展		(198)

二月行动

——记市区中队第一次向日寇进攻

陈 敏

一九四三年底，我正在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国际统战部门工作。一天，当时的负责人黄作梅同志（一九五五年参加万隆会议途中殉难牺牲）告知我，组织上调动我的工作，并要立刻跟他回大队部见政委陈达明同志。

见了面，才知道陈达明同志原来就是在香港领导我们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老上级，也是我的入党监誓人，只是改了名字而已。寒暄几句，他就谈到抗日战争形势：由于香港是日寇南进侵略的基地和中转站，市区又是日寇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而香港同胞过去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日寇占领后对敌人的残暴统治又有强烈的民族仇恨。因此，在市区发动群众与敌人进行斗争，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最近东纵司令部指示要成立市区中队，就是要我们象一把尖刀那样插入敌人的心脏，把敌人牵制在市内。陈达明同志又说：“你是土生土长的香港女，情况熟悉。现在决定调你去市区中队工作，明天就要去报到”。

下午，大队长蔡国梁同志接见了我，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身材高大，身穿黑色短打（唐装）衫裤的同志，他肩上披着一件夹衣，腰间皮带插着一支擦得亮光的“驳壳”。双目炯炯有神，

威风凛凛。他给我第一印象就是精明机警，是位富有魄力的军事指挥员。他给我谈话时，交代市区中队的任务，简单明确；说到敌人则词锋犀利；谈到我们的同志则热情亲切。这次谈话的内容很多，其中使我毕生难忘的有几句话：你们要立刻出发到军警、特务多如牛毛的香港市区，在敌人心脏里开展地下游击活动，斗争将是艰苦而又复杂的。你们一定要坚强，就算被鬼子强奸了，也要活下去，与敌人斗争到底！

军令如山！我就带着两位首长的嘱咐与期望，第二天天一亮，就跟着交通员去到大队部附近的一个交通站，向中队长兼指导员方兰同志报到。初建的市区中队，只有一个官——二十三岁的方兰，一个兵——二十岁的我。

一、初试锋芒

兵贵神速，在雷厉风行的指挥员方兰同志的领导下，我们立即行动起来，通过各种关系，同留在市区的同志和过去进步团体的群众取得联系，从中发展游击队员和“游击之友”。

当时中队部设在香港郊区鲤鱼门附近的槟榔湾（行政区属新界西贡），联络站则设在中队部附近的一个面临港湾的渔村小镇——坑口。从这里去香港筲箕湾，如风平浪静，渡海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坑口只有一条街，一间小茶馆和几间小铺，其中有一间是卖淘化大同酱油的酱油铺。小镇南边靠海湾处有一个小码头伸入海面，长约十余米。小渔船都在那里停泊，经此转入内地。所以，经常有些水客来往。

我们通过酱油铺的“老板”肥佬曾，在靠近街尾的地方租了一个铺位，一九四四年元旦刚过就开张营业，卖些针头线

脑，发夹、花边等农村妇女的日用品。市区队员来联系工作时，打扮成“水客”，随身带点小店卖的物品，既可以解决货源，又可以掩护自己的身份，当天还可以乘小艇返回市区，来往比较方便。方兰和我化装成客家妇女，头上梳个大髻，身穿唐装衫裤，系上围裙，脚穿“千里马”（象现在的人字拖鞋，不过当时没有软胶底，是用旧轮胎做的），出门时戴上竹笠或凉帽。我们在小店楼下做买卖，阁楼就是联系接头的地方。有时我们也去市区与队员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中队很快就联系上一批同志，分散在筲箕湾、湾仔、中环、九龙各区都有，多数是单线联系。

“散兵游勇”一经组织起来，就会变成巨大的力量。这些同志在日本鬼子的奴役下早已满腔怒火，个别同志也曾自发地同敌人作斗争。现在有了市区中队的领导，参加了地下游击组织，打鬼子的劲头更大了。大家都在磨拳擦掌，等待命令。

时机终于到来了！

那是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一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袭击香港启德机场，其中的一架飞机被日寇击中，美国飞行员克尔中尉跳伞逃生，正好落在沙田地区的山地上。游击队小鬼“石头仔”（原名李石）把他救起来，藏在一个山洞里。日寇为了捕捉美军飞行员，出动大批人马，把沙田地区包围起来。但是，不用说找不到人，就连降落伞的痕迹也找不到！在光天白日下，被日军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竟然无影无踪。鬼子恼羞成怒，疯狂地向我港九大队的活动地区进行扫荡，持续了半月之久。

在这个紧急的情况下，中队接到大队长蔡国梁同志的命令：“市区中队主动出击！”

我们中队部是处于敌人包围圈的边缘。我们根据毛泽东同

志的战略思想，决定从内线冲出去转到外线作战。我们的特殊武器就是“纸弹”。

二月十八日，方兰和我来到市区，分头布置人员在日寇心脏地区散发革命传单。虽然，第一次行动没有经验，但事前作了比较周密的布置，决定在二月二十四日全中队统一行动。实行公开张贴和秘密投递相结合，必要时还带上手套，以免留下指纹。这次散发的传单主要是《东江纵队成立宣言》（简称《宣言》）。《宣言》中正式宣告我东江纵队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并肩作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个巨型“纸弹”，对打击敌人、鼓舞港九同胞的士气都将起到重大作用。对我们市区中队的游击战士，也是一次练兵的好机会。

二月二十四日到了，中队战士都投入这场“纸弹战”中去。

筲箕湾区力量较强，战斗任务也较大。战前这个区的群众曾受到“余闲乐社”、“致基社”等进步团体的影响。市区中队成立后，江水同志把筲箕湾张洪波领导的一个游击小组支援我们。其中有水上渔民，有太古船厂工人，还有象“黑旋风”式的人物——大头九。人多势众，地形又熟悉，他们除了把《宣言》张贴在工厂、街道、公共厕所外，还投了一张给该区伪区长曾某，那是刚十六岁的“墀仔”（即徐墀）自告奋勇去投递的。为了分散敌人注意力，张洪波还派了队员梁子辉设法去中环张贴，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这个好小子竟然勇敢地把《宣言》贴到中环街市敌人的“布告板”上去！

中环区（包括湾仔）的队员也不示弱，连老同志伍惠珍、黄微等也参加了这次行动。特别是杨作光同志，他有几个“老

友记”是理发员，也跟着去干。反正，打鬼子的事，他们都很齐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张咏贤烈士（她在三·一七事件中被捕后在加路连山就义），当年她才十九岁，家人都是基督教徒，她在圣保禄书院（教会办的英文学校）读书，原是一个典型的“香港小姐”，日寇侵占香港后，亡国奴的耻辱，唤醒了她的民族感和爱国热情。后来为了生活，她进了“日立造船厂”分部当描图员（原为敬记船厂，日寇接收后制造“电扒”）。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杨作光同志，杨对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吸收她参加市区中队。她很快就成为我们安插在敌人军工厂的情报员。二月二十四日她也参加行动，除了用信把《宣言》寄给亲友外，还在电车上散发。因为她打扮入时，年青而又漂亮，谁也不会怀疑她。

九龙区有一批原来参加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的进步群众，中队把他们发展为队员，他们在红磡船厂、中华书局和工务局（干下水道工作的），也用各种方式散发《宣言》。

中队第一次出击，胜利了！首先锻炼了这支刚建立起来的港九人民子弟兵，任务完成得干净利索，经受了一次很好的考验，增强了对敌人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根据港九大队史料记载：日寇寻找美国飞行员的千人大扫荡终告失败，于二月二十六日开始撤退。也就是在我们行动后两天，敌人开始撤退了。

二、一个小插曲

人们在议论着：《宣言》这批新式武器，是怎样从被重重包围的大队部，飞越敌人的道道封锁线，到达香港市区的呢？

话要从头说起：

二月十一日，美军飞行员被迫跳伞下来后，日寇就开始搜索沙田地区，因为启德机场就在沙田区观音山脚下，敌人扫荡了好几天都一无所获，便把扫荡区扩大到盐田等整个新界。就在这个时候，大队部发下了一批《宣言》。当时因有敌情，就把它埋在槟榔湾靠海边悬崖的石洞里。

在接到大队长蔡国梁同志下达的市区中队进入市区散发《宣言》的命令后，当时大家商量，怎样才能把这批“武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从陆路经过井栏树到牛池湾出九龙呢？因为这一带敌人正围得水泄不通，没有可能通过；只有从包围圈的边缘，经水路运出去。我们的水上交通员梁蓉妹，是张洪波的爱人，我们都叫她“张嫂”，她本人是筲箕湾的渔民，有一只小艇，来往于坑口和鲤鱼门之间。我们把大包的传单分成三包，放在小艇的舱底，上边盖上木板，再放上一堆又脏又腥的小咸鱼。十八日前，“张嫂”就巧妙地把传送到筲箕湾，一包给了张洪波，一包转给了湾仔的伍惠珍。我们把香港中环、湾仔两个区的任务安排完毕，才进一步考虑九龙地区的“纸弹”怎样过海。香港九龙遥遥相对，中间隔着一个维多利亚港，两地来往，只能靠轮船过海。方兰在安排了九龙地区的任务后，决定把传单送给九龙市区的交通员——小胡，由他去转给各路队员。

二十一日上午，我去方兰家，研究传单过海问题。开始时，想要小胡过海来拿，但一考虑又有许多不便，而且小胡长得瘦弱，又是一个卖破烂的青年人，容易引起别人注意。怎么办？任务只好落在我们这一官一兵的头上了。我是比较理想的对象：外表是一个文弱的年青姑娘，又是本地人，情况熟悉，打扮一下，谁也不会把我当作游击队员的。我说了以上的意

见，方兰就同意了，临走时，她还一再嘱咐我要千万小心，见机行事。

二十二日早上，家里那个古老的鱼尾钟敲了六下，我就起床，母亲问我为什么这么早起来，我说要去新界找个朋友。她就嘱咐我，今天是大姐（即陈琼大姐，后夫妻俩都参了军，抗战胜利前夕，由于缺医缺药，她病逝于大鹏湾）结婚的日子，不要忘记回来参加婚礼。我应了一声“忘不了”，就点了油灯，梳洗后，薄施脂粉，穿上一件上大学时穿过的红格子大衣。就把那卷传单小心地放在一个花布提包内，上面放着刚织好的毛线衣和一些毛线。刚坐上西行的电车，谁知在大王东街站，看见老同学黄楚翘（黄作梅的大妹）上车来，我只好装着看不见，把头扭向车外，因为任务在身不便和别人打招呼。

七时多，来到计划过海去佐顿道的统一码头，只见过海的人比较多，个别人还要被搜身。此路不通了。我只好绕道东行，到天星码头看看。这个渡轮是去九龙尖沙咀的，过海的人不算太多。远远看见码头尽处有个日本宪兵在无精打彩地踱来踱去，可能是值夜班的，在等待交班。码头入口处，有一男一女的宪查在长桌边聊天，我来回视察了一阵，发觉那两个宪查都不闻不问，就下决心走向码头，大摇大摆地买了票，过了关卡，经过那张长桌边，突然那个男宪查说要看看我的提包，我就把提包打开，只看到露在上面的毛线，谁知那个男宪查伸手向提包内掏，一下子就掏出那卷传单来。当时我的心快跳出喉咙了，想晓以民族大义，又怕惊动那个日本宪兵。只见那时男宪查问我这是什么东西？一霎间我想起“纸弹”的威力，就迸出一句话：“你自己看吧”！男宪查打开了那卷传单，一眼就看见一行醒目的红字《东江纵队成立宣言》。顿时，两个宪查的脸都吓青

了，连忙快手快脚把传单塞回提包。当时，我象条件反射一样，也伸手去塞毛线，一时六只手都塞向提包。那个男宪查说了一声“走吧”，我出了一身冷汗，快步走向船边，踏上跳板就上船去。回头看看码头尽处的那个日本鬼子，还象木头人那样踱来踱去。

上船后，才感到后怕，不知那个宪查是否“放长线钓大鱼”？如果我送传单的任务完不成，就会影响二十四日的大行动。怎么办？后来我把心一横，决定先过了海再说。

上岸后，我在尖沙嘴坐上一辆单车尾，看看不见有“尾巴”（即跟踪）就在弥敦道的大华戏院附近下车。本来小胡就住在附近，但我还担心有“尾巴”，便在小街再坐上单车尾往深水埗去，到了太子餐室下车，转了几个圈，然后到我表姐家。虽然是早春二月，天气还冷，但我已满头大汗。表姐见了我，心疼地说：“看你一身大汗，干吗那样急？先脱下大衣，洗洗脸吧！”我趁表姐忙着为我煮米糊的当儿，冷静地思考着码头上发生的事情：放我走是真是假？《宣言》真的是那样大的威力？他们面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姑娘，就会吓坏了？许多问号都涌上心头。最后想起了临走时方兰说的要“见机行事”，我想到假如那两个宪查“反水”，我那件红格子大衣就会成为敌人追捕的标志，我决定换装。表姐是星加坡归侨，我俩人感情一直很好，我正想着怎样开口，表姐从厨房出来了。我说：“今天真有口福，在这里有东西吃，今晚大姐结婚，两头亲家聚餐，我这个小姨子又会捞上一顿饱饭”（因为当时生活困难，结婚都不请客，所以表姐也不参加）。表姐说：“你这个样子去参加婚礼，不怕别人笑话？不如我替你打扮打扮吧！”说罢就动手给我梳妆，还用烫发钳给我卷发。表姐又盯着我脱下来的那件红

格子大衣说：“大衣红色好是好，就是缺少一点雅致，不如穿我那件绿色丝棉旗袍吧。”她不等我表态，就去房间拿出那件旗袍给我穿上。表姐的主意正中我的下怀！顿时，我这个长发红格子大衣姑娘，就变成卷发的绿旗袍姑娘了。

到了下午三时，我又向表姐要了一个比较好的提包，装好传单，辞别了表姐，从深水埗乘单车尾到了旺角道，找到那个废品收购店，把那个提包“卖”给了那个“收买佬”——小胡。

离开收购店，大街上很平静，我的心情也渐渐平静下来，任务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心里感到说不出的愉快！

路上，我还想着要向领导汇报，但一想还是慎重一点好，反正下午四时大姐的婚礼在中环安乐园聚餐，倒不如天黑以后再去。晚上到了方兰家，她正等得万分焦急哩，见我穿着长旗袍，慢吞吞地去找她时，一开口便说：“真是急死人了”。我心平气和地将详细情况汇报后，她果断地命令我：立即撤退，情况待查。

我赶在灯火管制前回到轩尼诗道家中，夜里兴奋得睡不着觉，心里却又装满了许多问号。不知不觉，那个古老的鱼尾钟敲响了四下，我立即起床，梳上了大髻，穿了黑色唐装衫裤，脚踏“千里马”，提着一个小黑布包袱，匆忙地出了家门，又踏上回槟榔湾的征途。

三、后　　语

序幕是伟大的，但以后的斗争更加伟大。

在二月行动中，我们获得了第一次出击的胜利后，就抓紧时机，发展组织，壮大队伍。

三月十七日，发生了冯芝、张咏贤两烈士被捕事件，我们从这事件的挫折中提高了警惕性。狱中传来：她们虽然受到严刑拷打，但在敌人面前表现得英勇不屈，大义凛然，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崇高气节！这样更激励着全体队员，以更大的革命热情和坚强的斗志，投入对敌斗争中去。

到了四月，中队布置了一次规模更大的行动：散发各种革命传单，并在日寇九龙宪兵本部对面的窝打老道第四号火车铁桥进行爆炸。“一雷天下响”，敌人心惊胆颤，手忙脚乱，他们把正在郊区扫荡的鬼子们匆忙调回市区，我们又一次成功地粉碎了敌人扫荡的阴谋。

游击队爆炸火车铁桥的消息对港九同胞影响也很大，有一位队员反映：传说有人在不久前，见到当年学赈会的孔秀芳（即方兰），当上了游击队长啦！有一次还带着一批传单过海，后面还跟着几个便衣警卫呢！这传说绘声绘色，有板有眼。港九大队市区中队的斗争只不过是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而这个小小的插曲，正说明了“得道多助”的真理。